清初阙里“孔门词人群”的形成及其词学观念

杨秋圆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清初“阙里三孔”孔传铎、孔传鋐、孔毓埏，受到因编纂《幸鲁盛典》而齐聚阙里的江南诸子影响开始了诗词创作，并发起了长达十年的“学步社集”。“孔门词人群”则是在“学步社集”的基础上，以孔传铎、孔传鋐词集刊刻为契机而形成的，且在撰写序跋与评点二人的词集时，体现出他们的词学观念：时代风气影响下的“新颖之笔”，圣裔之家传统熏陶下的“清雅之意”，超越自身的“情厚之致”。“孔门词人群”还对“情”有进一步的思考，包括“情文交织”“声情配合”以及以深情达到“幽细深远”之词境。

关键词：孔传铎；孔传鋐；“学步社集”；“孔门词人群”；山左词坛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117-09

收稿日期：2025-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57）：《历代词籍总目提要》及文献数据库建设。

作者简介：杨秋圆（1995-），女，江苏常熟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2.016

阙里孔氏为“圣裔之家”，自宋代开始，嫡长子孙世袭“衍圣公”之位。孔氏家学源远流长，以经学为主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历代亦不乏长于艺文者。但孔门由宋至明习词者寥寥，清代始有习词之风。清代孔门填词风气始自于康熙时期的“阙里三孔”：孔传铎、孔传鋐与孔毓埏，而后数朝不乏词人。道光年间，孔昭熏、孔昭蒸辑有《阙里孔氏词钞》，为孔氏一门词作之总集，以孔传铎开篇单独列为一卷，足见推崇。先前，学者已经注意到“大约在康熙中后期，阙里存在一个相互交往、倡和的词人群体。”①并对“阙里三孔”与“名不见经传的曲阜词人”②进行了初步的考察。由此，可引出两点疑问：其一，聚集于阙里的词人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其二，这个词人群体是否有特殊的词学观念？

一、聚集阙里：清初阙里孔氏与“学步社集”

文人群体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指有组织、有共同主张和行动的群体，也可以指松散的、有共性特点的作家群落，但都有较为核心的人物。清初孔氏最早致力于词者为孔传铎、孔传鋐兄弟与孔毓埏。孔传铎（1673—1735），字振路，号牖民，为孔子第六十八代孙，衍圣公孔毓圻长子。其词集为《红萼词》与《炊香词》，存词 531 首。孔传铎还积极参与“选政”，涉及诗、词、文三种文体。词选包括与顾彩、孔传鋐合编的《草堂嗣响》、单独编选的《名家词钞》及《同调词》。孔传鋐（1678—1731）为孔传铎胞弟，字振文，号西铭。其词集为《清涛词》与《蝶庵词》，存词 501 首。孔毓埏（1665—1722）为孔毓圻弟，字宏舆。其词集为《蕉露词》，存词 200 首。③ 三人存词数量均不少，可见对词并不是偶然为之。孔传鋐习词还直接受到长兄与叔父的影响，在《清涛词序》中提及“余束发学吟，穷思求工，苦于望洋，初未知诗律之外有所谓词也。及长见叔父、长兄皆作词成帙。窃窥之，风流蕴藉，犁然有当于人心情。跃跃动试，操管效颦……”④由此，康熙时期

①丁鹏：《清代山左词坛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 年，第 91 页。

②王帼英：《清初阙里孔氏词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系，2009 年，第 23-35 页。

③陆勇强《〈全清词·顺康卷〉辑补 43 首》根据蒋重光《昭代词选》补《古调笑·柳》1 首，则孔毓埏共存词 200 首。（见《衡水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

④[清]孔传鋐：《清涛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据康熙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240 册，第 69-134 页。文中所引孔传鋐词若无注明，皆出自此本。

“三孔”的创作引领了清代孔门的填词风气，而孔传铎又是“三孔”的核心。

“三孔”的身份颇为特殊，他们都属于孔氏大宗。孔氏大宗虽和王公贵族、朝中大臣多有交往，但主要职责为祭祀，实则“有位无实权”。孔毓埏康熙十八年(1679)袭五经博士。孔传铎康熙间赐二品冠服，但无实职，身份只是“储公”，早岁就在诗书中觅生涯“百不如人但嗜书。”“问我一生何所有，诗酒。”(《定风波·自题轩中》)[①]孔传鋐康熙四十五年(1706)袭五经博士，康熙欲用，孔传鋐辞以职在奉祀。孔传鋐诗集名为《补闲集》，自称为“闲人”，显然带有一定的自嘲因素。对孔门来说，身份既是需要传承的东西，又何尝不是一种“约束”。考察阙里孔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是从另一层面考察孔氏文人复杂的心态，此为孔门文学特殊的价值所在。三人均因身份特殊长居阙里，为文人群的形成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条件：核心人物与较为固定的地点。

那么“孔门词人群”是如何形成的？回顾孔传铎的创作生涯，“孔门词人群”的形成离不开两件事：其一是《幸鲁盛典》的编纂，其二是“学步社集”的开展。

《幸鲁盛典》为记载康熙祭祀孔庙事迹、收录东巡幸鲁诗歌的总集。《幸鲁盛典》的编纂从人员选择到校订修改由衍圣公孔毓圻一手操办。孔毓圻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请求修撰《幸鲁盛典》，后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校订再上。孔传铎时年尚幼，但目睹了编书的过程。他在《申椒集序》中回忆当时情景：“舞象时，江南诸子以纂修来者，云集池上。因得往参其间，见金子谷似、孙子松坪、俞子大文辈，无日不以倡和相娱，油然乐也。不禁见猎心喜，退而效之”。[②]《幸鲁盛典》成书之年孔传铎15岁，与一些人物保持了长时间交往。

《幸鲁盛典》的编纂使得江南诸君子齐聚阙里，诸子编纂之余诗词倡和自娱，因此孔传铎、孔传鋐耳濡目染对诗词产生兴趣。那么持续十年的“学步社集”就是他们实践的成果。孔传铎《安怀堂文集》中存有《学步倡和集选序》，据此可了解“学步社集”的大体情况。“学步社集”是由“三孔”发起的诗词倡和集会，“学步”的目的在于提高创作水平。社集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四十七年(1708)，持续了十年，孔传铎时年25至35岁。每次社集必“一诗一词”，显示对词创作的不偏废。参与社集的人数较多，且参与方式较随意：“或四方或同邑或吾宗。四方诸友或偶一至焉；或岁频至焉；或信宿余家；或十年不去，但同心者辙邀入会。”“月必两举焉或一举焉。”[③] 遗憾的是，序中未涉及具体创作情况，《学步倡和集选》亦至今未见，我们只能通过保存在“三孔”诗词集中的倡和作品略作还原。

总体来看，社集时间可分两类：一类是节日或节气，属于“自然之事”；一类是接风饯行的“人事”。地点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孔府的亭台楼阁，如绿藤轩、东园、水南庄、九如堂、三砚斋、亦雨轩、五全庄等；一类是阙里的名胜古迹：如周公庙、鲁城、泗水等。因每次社集“一诗一词”，则诗词可以对看。现略举几例说明创作情况。社集之作题为“集字”“赋得”“分咏”。以《惜纷飞》“咏别”为例，孔传铎《红萼词》中保存了一组：雨中别、江干别、花下别、邮亭别、岁暮别、梦中别。咏物之作将物与环境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具体的情境。题材上多吟咏闲适生活。另以一组《渔家傲·十二月行乐词同顾天石赋》为例，这一组词是孔氏兄弟、顾彩和沙西京的倡和之作，如今惟见孔传鋐《清涛词》中《渔家傲·十二月词，同顾天石、家大兄、沙西京赋》一组，可与孔传铎词作一比较。孔传铎词四月描摹的意境是“笋绽布谷啼”，孔传鋐则是“春山迷春雨”，各有侧重，为避免重复，更需要细密的构思和意象选择。孔传铎所作其五、其六、其九、其十一后都有顾彩评点。其词妙在每月景象之刻画精准。如四月春山莺语迷蒙：“苍山隔断春归路，高下麦畴云锦布。迷津渡，回头却被莺声误。”六月雨势之急：“乱颓绿荷催雨至，残虹又报斜阳霁。”九月秋雨连绵、黄叶纷飞：“多雨常愁泥活活，双螯斗酒常虚设，嘱付村童休扫叶。”皆意到笔随，清雅可喜。

孔传铎、孔传鋐的词作展现了世家子弟文雅的生活情趣和追求，技法上擅长描写物理，刻画细致入微，情感上以抒发逸致闲愁为主，也基本能概括聚集在阙里的文人倡和诗词的特色。

---

①[清]孔传铎：《红萼词》，《清代诗文集汇编》(据康熙刻本影印)，第231册，第257-325页。文中所引孔传铎词若无注明，皆出自此本。

②[清]孔传铎：《申椒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据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影印)，第231册，第191-256页。

③[清]孔传铎：《学步倡和集选序》，《安怀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据孔氏红萼书屋钞本影印)，第798册，第284页。

二、评点刊刻："孔门词人群"的形成与规模

如果这群聚集在阙里的文人仅以词倡和，或为诗歌倡和的附属，特色并不突出，难以称为"孔门词人群"。社集活动往往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形成、发展、高峰、衰落，到最终因人员流动、去世而解散。"学步社集"也是如此。[①]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社集最盛的时期才是"孔门词人群"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事件是孔传铎、孔传鋆诗词集结集刊刻，同时词人参与评点。评点人大多重复，说明这是群体持续性的活动。那么直到评点这一活动的展开，"孔门词人群"才得以命名。孔传铎与孔传鋆的诗词集均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左右刊行，多人参与编定、撰写序跋，说明此时阙里聚集了很多文人，社集活动非常活跃，则"孔门词人群"形成的时间可定在康熙四十五年。

"孔门词人群"最主要的词学活动便是参与词作评点和撰写序跋。评点对象集中在孔传铎《红萼词》与孔传鋆《清涛词》上。二者都题顾彩选评，则顾彩是两本词集的主评者，也是孔门词人群除"三孔"之外的又一核心人物。两部词集有评有点，使用符号为圈、点，标注秀句和句读，评语为尾评。评语的形式比较随意，很可能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流传，反映出一种创作的"原生态"，也说明"孔门词人群"不存在标榜之风。具体来看：其一，词集评点中署名较为随意。有兄弟叔侄相称者：舅以永、弟西铭、叔宏舆、兄振路。凡孔氏族人皆只称号，不加姓氏，则姓氏是默认的。其二，除了"题词词"的评点外，几乎不提当代词家，不涉比较，只涉及宋词名家，但也不是惟宋词风格为标准，内部各抒己见，更多是纯粹的批评。大部分词作有一人评，少数词作多人参评。评点的数量也相当随意，除顾彩是主评者外，孔传商评论 10 条，孔尚任评论 6 条，叶世福评论仅 2 条，评点数量相差很大。其三，有部分评点记录了对于一些事件的共同回忆，或是超出文本的有感而发。

由此，"孔门词人群"具体的成员名单已基本确定。首先列出参与评点者。评点孔传铎《红萼词》有 22 人，评点孔传鋆《清涛词》的 28 人，两者结合去其重复(19 人)合为 31 人，分别为：孔传铎、孔传鋆、孔毓埏、孔传商、孔衍棪、孔尚任、孔贞灿、顾彩、孙致弥、罗志行、李为龙、章鼎可、钱杓、许顾青、陈见智、沈康三、黄郑琚、张尚瑗、许谷、詹榜、何图、罗兼三、张希龄、叶吴京、叶世福、叶李晖、叶济之、沙西京、沙东藩、沙北椒、沙南苍。

其次列出参与编选词集者。周佑予，参订《红萼词二集》。唐肇，参审《炊香词》[②]。刘浦，参审《炊香词》。撰写词集序跋者：汪芳藻撰《红萼词》序[③]、参审《安怀堂文集》卷上，沙克岐撰《清涛词》跋。另外，理想情况下"孔门词人群"成员应是既参与倡和又参与评点者，但参与评点者也可能不善作词，却对词有独特的见解，如孔尚任，孔传铎《东塘岸堂石门诗全集序》对他的评价是："诗馀非先生所长，落落数阕姑亦辑成一卷，以示先生游戏之所及耳。"综合以上名单，则"孔门词人群"不少于 36 人。

最后，可以得出"孔门词人群"是以"三孔"为中心，亲友为主，四方之士为辅，相对封闭的词人群体这一结论。孔氏同族共 7 位，同邑有 1 位，亲友有 11 位。以上以身份划分，明显可见"孔门词人群"是以"亲缘"为主的词人群。而采用另一分类，分为长期寓居、时常往来与偶然拜访三种，则更能还原倡和的真实情况。王帼英已考察了部分词人情况[④]，以下对重要者的生平略加补充：

其一，长期寓居者：

孔衍棪，字炎木，号慎先，康熙间岁贡生，官青城训导。

---

①孔传铎《申椒集》中有诗《闲集亦雨轩读送诗至"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之句，因忆顾天石、张损持、宋云生、钱汉文、罗士岩、章鼎可、叶孟端诸子兼怀钱方蓼、罗承公、毛艾仲、孔墀来皆成古人，不禁一时聚散之感》等。

②《炊香词》即《红萼词二集》，《炊香词》是将《红萼词二集》(清钞本)中的词作重新分调排列而成。

③孔传铎《红萼词》前还有宋荦、陈于王序。宋荦为孔传铎前辈，工诗，声名既隆，序文对孔传铎多褒扬之语，或是出于应酬，实未切其妙。陈于王以诗为长，和孔传铎多诗歌酬唱。遂暂不把宋荦和陈于王列入。

④王帼英《清初阙里孔氏词学研究》根据三孔别集中提到的姓名，已经列出了部分人物，并详细介绍了"三孔"以及"名不见经传的曲阜词人"罗篮豫、章鼎可、黄郑琚、许顾青、孔贞瑄、孔贞灿、孔传商、孔衍棪、孔尚任、陈见智及顾彩 11 人。

孔贞灿，字垣三，号西园，孔氏四氏学录。

孔传商，字振子，号大光，孔传铎、孔传鋹弟。雍正二年(1724)赐候选县丞。

陈见智，字体元，号力庵，曲阜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历任多地，后以论事忤上官，归家教授。其著有《一线天传奇》《哂园吟草》，与孔贞瑄(号璧六)感情深厚。

许顾青，字复阳，昆山人，与孔传铎、孔传鋹结交甚早，兄弟二人以夫子称之，最后卒于阙里。孔传鋹词有《金缕曲·挽复阳许夫子，再迭天石韵》。

章鼎可，孔氏家学学博。孔传铎诗有《赠章鼎可新授家学学博》。

唐肇，字驭九，江苏泰州人，顾彩门人。其为孔尚任《桃花扇》题辞，自题为“岸堂从学人”，参校孔传铎《炊香词》卷上，词有《贺新凉·谒阙里即事》《满庭芳》(路出仙源)。

刘浦，字荻江，湖北黄冈人。其参审孔传铎《红萼词》卷中、《安怀堂文集》卷下。孔传铎诗有《书中干蝴蝶同顾天石、许复阳、罗志行、王秋史、章鼎可、李为龙、刘荻江、家璧六、东塘、大光限赋》。

其二，时常往来者：

罗筮豫，字志行，安徽青阳人，六十六代衍圣公孔兴燮甥。《申椒集》罗序“丙子岁(1696年)，余絜家来往阙里，则刻烛分笺之事无日无之”①。

黄郑琚，字以永。孔传铎撰有《舅氏黄以永诗序》《舅氏黄以永小传》《舅氏黄以永秋碧词跋》。孔氏兄弟与顾彩整理黄郑琚词作，是编纂《草堂嗣响》的直接动因之一，“得黄子以永遗稿，意欲汇为一编聊以自携，而兼取平日所爱名家诸作，忝列其间以为程序”②。

沙氏兄弟，均为少时来阙里读书的同伴。三孔有不少送行之作，如《送沙西京表弟东归》：“童稚随姑来，嬉戏床前舞。”

吴中叶氏，叶世福，字民佑。叶李晖，字篆鸿。

青阳罗氏③，罗兼三，字承公。孔传鋹诗有《送罗承公南归九华》。

张希龄，字懋龄，传铎妹丈。孔毓圻女“伯适遂宁张氏”，此女为孔传铎、孔传鋹胞妹。

其三，偶然拜访者：

周佑予，字仙槎，江南华亭人，辑有《清诗鼓吹》四卷，所收为自万历至康熙中叶间七律，有孔毓圻康熙四十七年(1708)序。传铎诗有《喜华亭周仙槎重过阙里二首》。

张尚瑗，字弘蘧，又字损持，江苏吴江人，工诗与骈文。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其著有《石里诗钞》《石里泽家集》，曾为陆培词集《白蕉集》作序。孔传鋹诗有《冬日张损持太史过阙里邀同宴集即席赋赠》。

钱杓，字汉雯，浙江海盐人。孔传铎诗有《喜海盐钱二兄汉雯入会》，词有《忆余杭·简海盐钱汉雯》。

许谷，字贻孙，江苏常熟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

叶吴京④，又名如绪，字孟端，江苏昆山人。

詹榜，字虎宜，浙江仁和人。孔传铎诗有《走寄和州詹虎宜》。

汪芳藻，字蓉州，安徽休宁人，擅诗画，尤工骈体文，著有《春晖楼骈体》。

何图，字义文，盛京长白人。孔传铎诗有《寄答何义文》。

仍有李为龙(孔传铎《安怀堂文集》卷下有《书故友李为龙像帧》)、沈康三、叶济之(疑为昆山叶氏族人)3人生平经历不详，待考。

“孔门词人群”中顾彩、孙致弥致力于词，并在词坛较有声望，需重点考察。顾彩与孔传铎、孔传鋹相交

---

①[清]罗筮豫：《申椒集序》，孔传铎：《申椒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1册，第194-195页。

②[清]顾彩、孔传铎、孔传鋹：《草堂嗣响·例言》，康熙四十八年(1709)辟疆园刻本，第1a页。

③沙氏、叶氏、罗氏均为孔府姻亲。“莱阳沙氏”：六十六代衍圣公孔兴燮女仲适莱阳沙氏。“吴中叶氏”：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继配叶灿英为昆山叶氏，为吴中叶氏的一支。“青阳罗氏”：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衍植女次适青阳罗氏。

④孔传铎《同调词》作“叶如绪”。(康熙六十年1721稿本，国图藏本)《旧雨集》作“叶吴京，孟端，江南昆山人。”(康熙钞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姑且两存。

三十年，合编《草堂嗣响》，对“孔门词人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与孔氏兄弟的交往情况已被学者详细考索[①]，此处不再赘述。孙致弥(1642—1709)字恺似，嘉定人，工诗词，曾居住在京城“古藤书屋”，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其词集有《别花余事》《梅泬词》《衲琴词》，并辑有词选《词鹄初编》十五卷。楼俨为孙致弥门人，在《杕左堂集序》中言及：“首问作词之法，先生教以当学乐笑翁……与陆辅之《词旨》相互发明。”并评孙致弥词：“《别花余事》则绝类东山、草堂、小山、淮海；其《梅泬词》又旁及于青兕，而变化于乐笑。其清空骚雅骎骎乎可追乐笑矣。”[②]则孙致弥词学张炎，应受“浙西”一派影响较大。其编选的《词鹄初编》特别重视词的格律。孙致弥和孔传铎的交往始于《幸鲁盛典》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衍圣公孔毓圻奉命纂修《幸鲁盛典》，自任总裁官，孔毓埏任副总裁官，纂修八人[③]为孔毓圻推荐，书成后孔毓圻又曾为孙致弥请官。孙致弥与孔传铎交情匪浅，初见时孔传铎尚为少年，后二人交往二十三年，惜未见词学上的具体交流。

综上所述，“孔门词人群”是以“三孔”为中心，亲友为主，四方之士为辅，相对封闭的词人群体。“孔门词人群”的形成则是以词集评点、结集刊刻为契机，是阙里社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从序言上看，“学步社集”在两年后康熙四十七年(1708)就已难以维持，最终结束。虽然“学步社集”的结束并不代表词人倡和的结束，但意味文人齐聚阙里的盛况不在。“孔门词人群”也在形成之后便逐渐星散，没有再在词学上有更多的建树。

三、制约下的新境：“孔门词人群”的词学观点与影响因素

“孔门词人群”形成的契机是孔传铎《红萼词》、孔传鋆《清涛词》的结集刊刻，所以这一群体的特色不以词学创作见长，而在于词集评点和序跋写作。对他们的词学观念，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从序跋、评点入手直接考察理论，一方面从二人创作入手与理论相互补充。

(一)“新颖之笔”：时代风气与“清词中兴”

“孔门词人群”评点中“新”字出现频率最高。顾彩《清涛词序》评孔传鋆词：“以新颖之笔锋写香艳之字句。”《红萼词》中顾彩评《忆汉月·秋兰》：“极意摆脱，独出心裁。”《浣溪沙·戏用药名成句》：“巧妙生新，掷地有声。”《清涛词》中顾彩评《瑶台第一层·立秋》：“刻意推陈出新。”其中“刻意求新”一语已点明创作上的追求。孔传铎、孔传鋆兄弟的创作中确实有大量刻意求新之作，主要表现在词中多俊语巧思、词调上多僻调以及题材之新奇。由此，从创作和评点上均可印证“孔门词人群”对新颖的追求。

但刻意求新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刻意追求文字技巧会导致琐屑饾饤。顾彩对于孔传铎一些追求文字技巧之作，能避开其局限性申发其佳处，如在《一萼红·戏用词调名集成四时艳曲四首》后有近三百字的评语：

> 词家拈长调，最为难工。句欲其可断又欲其不可断，情欲其写尽又欲其不写尽，惟柳屯田为能悠扬鸣拍，软欸迷离，不知情之是景，景之是情也。红萼主人醉心兹道有年，于周、史有其细腻；于秦、柳有其香艳；于苏、辛有其豪畅，逌然清响，自成一家。昨出《一萼红》四调示余，…… 今即略其巧妙不论，止论词格亦在“荡月冷风”“当楼残照”之间，何不以是体播之骚坛，令好事者迭相倡和乎？则海内必曰：词家又树一赤帜矣！

“集调名入词”即以词调名嵌入词中串联成篇。孔传铎的四首集调名词，主题为闺情，分咏四季，佳句有“最是殢人娇处，一萼红心”“只待红窗睡稳，去梦扬州”“一剪梅枝弄影，落向湖边”。顾彩之论，“今即略其巧妙不论，止论词格亦在‘荡月冷风’‘当楼残照’之间，何不以是体播之骚坛，令好事者迭相倡和乎”，并不主张“以词调名入词”这一文字技巧推广到整个词坛，而是看重孔传铎长调“情景相和无缝”“逌然清响”

---

①姚金笛：《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5-112页。

②[清]楼俨：《杕左堂集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册，第315页。

③《幸鲁盛典》(康熙刻本)卷首题名：纂修官金居敬、俞兆曾、从克敬、孙致弥、叶滥、沙汝洛、章纬、曹晃8人，校阅官张拱枢、张元炜2人，收掌官孔尚侃、程士琏2人，誊录官许永、程兆彪、吴道行、张廷玟、沙潢、孔衍溥、冯暹7人。

的词格，欲播之词坛。

推陈出新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创作者的共同追求。从上文顾彩的评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词人的追求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为“自成一家”，另一个层面则是自觉地与宋人比较，追求当代的新声。清人眼中已有不少经典名家，但很少有词家只推尊一人，而是看到了唐宋名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欲结合各家长处后自成一家，这是一种自觉的“总结整理”。孔传铎《东风齐著力·自题词卷》言：“遥望屯田白石，成一调，郢雪争夸。”即要结合姜、柳之长。顾彩评孔传铎师法诸家，“于周、史，有其细腻；于秦、柳，有其香艳；于苏、辛，有其豪畅”，虽不免过誉，但对于“三孔”来说，“恨余僻处东陬”(《今词选序》)，身在词学中心区域之外，仍然有这份心致力词的创作和词选的编纂，足见“三孔”对于填词积极的态度。

推陈出新同时是一种时代风气的体现。清词的复兴在于时势与人心，清初“辇毂诸公”对词学大力提倡，也需同志者不停地奔赴，于是有词派之兴。同族、同邑填词之风兴盛则有郡邑词选之兴。相比较而言，“孔氏词人群”不在词学中心的江南，创作也并不突出，甚至孔传铎本身并没有致力于理论的建构，编词选只是想“置之案头，晨夕展玩”(《旧雨集序》)。上引顾彩之言，“何不以是体播之骚坛，令好事者迭相倡和乎？则海内必曰：词家又树一赤帜矣”，虽为一时兴起，结合“三孔”的“刻意求新”仍可见出蓬勃的生机。如此微小、不被人注意的“孔门词人群”也有“欲播之骚坛”之心，反过来印证了清代词学之兴自有其绵延不断的规律，只有不断地创新才是一种文体保存生命力的方法。“孔门词人群”对“新颖之笔”的追求，既是自身的追求，同时也是时代风气的体现。

(二)“清雅之意”：“圣裔之家”传统的熏陶与制约

孔传鋆将词集命名为《清涛词》，追求一种“娟洁自喜”的人格修养。其在《清涛词序》中言：“或问词曷以‘清涛’名也。余曰：风行水上，蹙而成涛，实天下之至文也。枚叟《七发》云：涛何气哉？夫涛以气言则又文而不弱者矣。顾余技短，未能浑灏流转，无所不纳。独生平娟洁自喜，不欲泥滓之犯我笔端。系之曰清，亦聊以鉴我心耳。”“风水相遭”本是论文之说。毛苌《诗传》云：“涟，风行水成文也。”后宋田锡《贻宋小著书》、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中提及，皆强调一种创作的兴会，不能自已而作。“三苏”之论文皆本于此①。孔传鋆此处借以论词，强调的是“涛”之“浑灏流转无所不纳”，还未能达到这一境界，于是在前加一字，把重点放在“清”上。则“清”不是外在的影响，而是自身“娟洁自喜”的本色，更是一种人格修养。并且孔传鋆明确界定“清”与绮语分开：“至于集中绮语曼词，虽或不免，要同庄叟之寓言，观者视为尘埃野马可也。”则“清”中已有“雅”的成分。

孔传鋆对“清”的追求，一方面是词人个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圣裔之家身份的制约。先看前者。“孔门词人群”中除了孔传鋆个性突出以外，顾彩同样是傲世之人。孔毓圻《往深斋诗集序》评论顾彩，“每不屑屈志卿相以乞援引，又不屑狎比其友以标声望”“落落穆穆，自游自息”。② 孔传铎序：“人有讥其负盛气，衿名节，踏疏狂，白眼傲世而不乐为世用者。而余之重天石者，正在此也。”③顾彩与孔传鋆可以说是气味相投。再看后者。沙克岐《清涛词跋》回顾了孔传鋆作词的状态，并言“西铭抱经世才，隐隐岳岳，如含百怪而包万象。然既不事经生业，又藉荫圣人之门，生食清禄，无所发泄，乃姑和其心、凝其气，一寄诸《花间》《草堂》之余，讵非能为涛，而不得不清者哉？”认为西铭词之“清”实际来自才能之大，而为身份所限，“生食清禄，无所发泄”，于是一寄诸词。

从作品来看，“清”的内涵多样，不仅包括人格追求，也包括词境上的“清空”。单独看孔传鋆词，较能体现这种“娟洁自喜”追求的作品在另一词集《蝶庵词》④中。此集有一部分长调述怀之作，如一组《金缕曲》词：“但得持身无瑕玷，完璧秦庭归赵。寒和暖，自知分晓。”这可以说是“清”的第一层内涵。在实际创作中，落实在作品中的“清”更多是词境上的清空，这是“清”的第二层内涵。孔传鋆《清涛词》中《相见欢·其二》：“池边雨过微凉。自生香。今夜簟纹萤影、似潇湘。”顾彩评：“我亦觉清。”《风入松》：“入眼千峰雪亮，

①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8-379页。

②[清]孔毓圻：《往深斋诗集序》，顾彩：《往深斋诗集》，康熙四十六年(1709)辟疆园刻本，第1a-3a页。

③[清]孔传铎：《往深斋诗集序》，顾彩：《往深斋诗集》，第4a-5b页。

④[清]孔传鋆：《蝶庵词》，清钞本，国家图书馆藏本。

荡胸万顷云饶。”“门外冷香一阵，红梅冶韵先标。”顾彩评：“亦是一时兴会所至，写来清绝。”以上诸词境界清幽，并无“我”之主观参与，而以冷笔写之。在孔传铎词中，顾彩评其长调“逌然清响”、谢章铤评价传铎之词亦言“词颇清疏”①。

事实上，“孔门词人群”在评点中将“清”“雅”共举。孔传鋆词《望江南》詹榜评：“四词清雅无比。”这四首皆咏江南风物，刻画了凄迷的春景。“清”“雅”并举，是将“清”与“雅”同化了。这种不涉绮语的写景之作也是闲适之心的表达，是高尚、雅致情操的体现。上文提及，孔传鋆对于“清涛”的定义已有“雅”的成分。孔传铎《红萼词自序》“方当雅化，何言仆本恨人”，明确了对于“雅”的追求。“雅”的内涵在于不涉绮语，含蓄蕴藉，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价值观。如《意难忘·席上各赠歌童以巾扇等物亦一时之韵事也，以歌纪之》沙东藩评：“偶然饾饤，一经雅人便成珍错。”孔传铎《惜余春慢·端午》西园评：“略过午节，单写午后闺房情景，尤妙在隐约之间，是为大雅。”实际是要用“雅”去补救“粗俗”，要在描摹日常生活的作品中体现“礼”和“度”。在情感表达上，“哀而不伤”亦要讲究一种节制，如沈康三评《雪梅香·望殳台怀古》：“慷慨而不过悲，吊古中大雅也。”

无论“清”是言志之作还是追求词境上的清空、感情上的含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与“绮语”相对。“清”“雅”并举，扩大并加深了“清”的内涵。孔传鋆与顾彩性格中的“狂狷”毕竟只占很小的部分，《曲阜县志》言孔传铎“生而恭谨、和厚，无圭棱，及遇事复刚果不可夺，勇于读书，工文辞，无究心濂洛关闽之学……精三礼，凡庙中一器物，无不详加订正”。② 其考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正人心”，则孔传铎是一个儒家传统价值观的践行者。“三孔”出于“圣裔之家”，长久耳濡目染，具有追求“清雅”、拒绝俚俗的审美个性。“孔门词人群”亦齐聚在阙里，其中章鼎可还为家学学博，必然会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制约。我们认为，传鋆集中“娟洁自喜”的寄托之作毕竟不是主要部分，对于“清雅”的追求更多是含蓄蕴藉和温柔敦厚。则“清雅”是自身追求与多种条件限制相结合的产物。

（三）“情厚之致”：基于身份的超越

“孔门词人群”评点中涉及“深情”之意有36处。如孔传铎《满江红·悼亡》叶吴京评：“情深如此，几疑彼一人珊珊渡银河来也。”孔传鋆《愁倚栏令》张尚瑗评：“含情无限。”《解连环·秋闺》罗志行评：“西铭长于作情语，尤妙在每篇有刻骨镂心处，故不觉其言之重复也。”此处点明了词工的原因在于情深。

追求“情深”是诗词创作的基本要求。此外“孔门词人群”的成员在强调“情”的重要性之上，还有进一步的思考。

其一，在具体的评点中，“孔门词人群”还进一步论及文学创作中“情与文”的关系，认为“情与文”相辅相成、伴随而来。如孔传铎《卜算子·玉钩斜》顾彩评：“遂起美人黄土之感，为是情生于文。”孔传铎《画堂春·游浮香亭》章鼎可评：“情生于文，遂动千秋之感，虽作者不自知也。”孔传铎《花心动·歌席有怀》孔传鋆评：“偶然杯酌，乐极悲来，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也。”都强调了“情与文”交织在一起。“歌席咏怀”为典型的闲适之作。上片写歌女劝酒起舞，眼中似有离索，下片咏怀，乐极生悲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从歌席想到人生。虽是烂熟之题，却因作者真情流露，带着生命意识的思考而能脱俗。

其二，孔尚任强调词中“声”与“情”的配合，认为词的音乐美来自于深情。《湖海集》中有一篇《蘅皋词序》，提出：“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非无诗与词也，无歌诗与词者也。”③强调了诗与词入乐演唱的特性，并将历代文体演变的内在特性归纳为音乐的变化。这一点并不是孔尚任的新见，明人俞彦《爰园词话》论“历代歌诗之变迁”：“周东迁以后，世竞新声，三百之音节始废。至汉而乐府出。乐府不能行之民间，而杂歌出。……五代至宋，诗有不胜方板而诗馀出。”④已把韵文形式之代兴，归结为载体的音乐体系之代兴。孔尚任特别重视“词”这一文体，因为按谱填词，词的音节尚在。《蘅皋词序》又指出：“夫词乃乐之文也，情

①[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唐圭璋：《词话丛编》（所据本为光绪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册，第3531页。

②[清]潘相纂：《曲阜县志·世家》卷六十，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第14a-14b页。

③[清]孔尚任：《蘅皋词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1册，第333-334页。

④[明]俞彦：《爰园词话》，《词话丛编》（所据本为蕙风簃藏本），第1册，第400页。

生于文，而声即生于情。凡不能入歌者，皆无情之文也。”孔尚任作为一位曲家，强调“情”的同时，又特别重视词体的音乐美，关注的是“情”与“声”的关系，认为他们相互补充。而宫叙五《蘅皋词》之所以“有声出于墨间”，就是因为“深于言情”。最后，孔尚任甚至想要以友人之作为范本，为之谱曲演唱，“虽不解宋人歌词之法，吾以意为其音节，口以传口，耳以传耳，成一代之乐，将自《蘅皋词》始”。

其三，顾彩认为词以“幽细深远”为上，须“情厚之致”才能达到。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红萼词序》中。《红萼词序》开篇即抛出“欢愉难工”的问题：“天下有韵之文，皆所以写情，而往往欢愉难工、愁苦易好者何也？盖情之抒写，比其有所不能已于中，而后发为文，始不自知其缠绵而深永、激楚而动人也。”顾彩认为“情能动人”的原因在于情之厚难以抑制，而与身处贫贱与富贵无关，因为情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接着顾彩回到词的问题上，认为晏殊、欧阳修“其赋情独厚，其旷览遐寄必有远于人境，而入于幽细者”。苏、刘、辛、陆“才气过人，词名亦与二公埒，而所遇迥殊，故其悲壮激楚或过之，求其幽细深远之致，则反不若焉”。词以“幽细深远”为上，苏、刘、辛、陆虽才高命蹇，但感情常奔涌而出，稍缺蕴藉。孔传铎正是富贵人、顺境人，类乎晏殊、欧阳修：“盖先生赋于情者，既厚而又养之以静气，涵之以学问，故其发为有韵之文，无不佳耳。”孔传铎词高处在于“情厚、静气、学问”，发为“幽细深远”。此境界恰是北宋词的审美特点，以抒发“闲愁”或无名的哀乐为主。“三孔”并未有艰辛颠簸的生平经历，恰好免去“悲壮凄楚”的情感抒发，转而去追求“幽细深远”的境界。顾彩的理论不仅为“孔门词人群”的闲适之作找到了合理性，更是作出提升，指出了一条新路。

以上，不管是“情文交织”“声情配合”还是以深情达到“幽细深远”之词境，都显示出“孔门词人群”对于“情”有进一步的思考，其内涵在不断丰富，是比较能够体现这一词人群的特色之处。

另有两点可以补充。其一，“孔门词人群”兼取南北宋，拥有较为包容的词学思想。“孔门词人群”在评点中多次提及《花间》《草堂》，而无批评之意，这一点看似与评点中出现“竹山、白石”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首先，《花间》《草堂》可能不是实指，而成了“经典”的代名词，是传统的、沿袭的批评术语。其次，孔传铎《东风齐著力·自题词卷》中同时表现出对“屯田、白石”的推崇。而孔传铎、孔传鋆创作中又多用柳永、周邦彦之自度曲，明确对周、柳的师法。词人群的评点中亦多次提及“周柳”：《红萼词》中《离别难·别绪》顾彩评：“了不拾周柳余物，正堪与二子神似，青出于蓝，此之谓也。”《清涛词》中《八声甘州》（又萧条黄叶满长空）罗志行评：“周情柳思合为一人。”说明了词人群对于南北宋大家的推崇，并不为词派所限。

其二，孔传铎拥有较为自觉的尊体与辨体意识，将词看作是一种案头文学，暗含着清词与宋词不同的发展方向。孔传铎在《选词粹序》中将词体的来源归于《诗经》与汉乐府：“自三百篇兴，长短句之体已备。其后汉乐府出，题多别创，不尽与诗义合。二者实词之昆仑也。”[①] 我们认为，此处从长短句形式的角度分析词的起源，不涉及音乐的本质，貌合神离，不免偏狭。在此之前，汪森《词综序》已将词之源头上溯到古诗与《诗经》。[②] 但孔传铎进一步申发：“特古长短句无定格，而此则一字一句不可增减，其宜平宜仄不可混乱，犹五七言诗，唐人取而律之。词也者亦长短句之律也。”强调了词体的特征和词律的严谨。这一点是基于词是一种案头文学而得出的。孔传铎在下文中着力反驳了历代选本的两个问题，“或多收调名而惟讲声律，或广列人物而去取未精”。前者问题在于“夫唐人歌诗，宋人歌词，元人歌曲。今诗与词皆不入歌，则成案头之书以其文章娱人耳，奚必琐琐为辨其声调哉？”词自然是一种音乐文学，但词乐失传已久也是定论，拘泥于词调的数量、形式不能完全还原词的音乐属性。后者问题在于“若论人物，则以功名传者，不必尽以词传，柳、周、姜、史岂尽台阁轩冕中人？亦节取其所长而已。”功名的高低与词学成就的高低不一定挂钩。由此，可以总结出孔传铎的观点，是将词看作一种案头文学，强调严谨的格律，认同词本身的价值不以功名而论。我们认为，孔传铎的辨体意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自觉地脱离了音乐的“束缚”，暗含着清词与宋词不同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孔门词人群”的词学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于“新颖之意”“清雅之意”“情厚之致”的追求。其

---

①[清]孔传铎：《选词粹序》，《安怀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8册，第286-287页。

②[清]朱彝尊、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价值不在于词学观点的“异军突起”，而在于词学观点的背后蕴含着多种影响因素，互相制约，激发出新的发展方向。

结语

“孔门词人群”是一个以“三孔”为核心，亲友为主，四方之士为辅，相对封闭的词人群体。这一群体的词学理论主要呈现在词集评点和序跋中。其新颖、清雅、情厚的词学观念，受自身追求、身份的限制，更有时代风气的影响，我们应看到其中的个性和共性。“孔门词人群”对于“情”的思考，能体现其特点。词评中的“竹山白石”“周情柳思”频频出现，说明孔门词人群词风并不在当时主流的浙西词风笼罩之下，而是兼取南北宋，较为包容。正因为“孔门词人群”并不强调一家一派的“词学理论”，所以说，他们的创作和评点都是自觉的、大众的，是从自身的体悟出发的，真实地展现了清初阙里一地的词坛生态。

“孔门词人群”聚集于阙里，但也不能脱离江南词学的影响。原因有以下三点：江南姻亲的熏陶。青阳罗氏、昆山叶氏无不是文学世家，无不来自江南。其次，大量与江南文人交游，这是一种长时间、群体性的熏陶。无论是《幸鲁盛典》的编纂，还是“孔门词人群”本身，大部分参与者均为江南文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顾彩。顾彩是孔传铎《红萼词》、孔传鋆《清涛词》的主评者，在“孔门词人群”的词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族人中如孔尚任早年在扬泰之间有丰富的交游经历，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到词人群。最后，江南地区自身文学传统的深厚、影响力大。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是词学中心区域，江南词坛名家辈出，前后接续，他们的词作被推重、甚至学习模仿。“孔门词人群”具有自身的特色，但也脱离不了江南词学的影响，这体现了清词发展的整体性。

The Formation of the Kongmenciren Group in Queli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ir Concepts of Ci Poetry

YANG Qiu-y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ong Chuanduo, Kong Chuanzhi, and Kong Yuyan, known as the Queli Sankong(三孔), were influenced by the Jiangnan literati who gathered in Queli to compile the *Xinglushengdian* (《幸鲁盛典》) and began their poetry creation. They also initiated the Xuebusheji(学步社集) that lasted for ten years. The Kongmenciren (孔门词人) group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Xuebusheji,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publication of Kong Chuanduo and Kong Chuanzhen's Ci poetry collections. In writing prefac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ir Ci poetry collections, their views on Ci poetry are reflected: the novelty influenced by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elegance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 of the Holy Family, and the emotional depth that transcends identity limitations. The Kongmenciren Group also has further thoughts on emotion, including the interweaving of emotions and words, the coordination of sound and emotions, and the use of deep emotions to achieve a subtle and profound realm in Ci poetry.

Key words: Kong Chuanduo; Kong Chuanzhi; Xuebusheji; Kongmenciren Group; Shanzuocitan (山左词坛)

[责任编辑　唐音]